

中国钱币丛书

甲种本之十



福建货币史略

福建省钱币学会 编著

中华书局

中国钱币丛书甲种本之十

福建货币史略

福建省钱币学会 编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建货币史略/福建省钱币学会编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01.10
(中国钱币丛书,10.甲种本)

ISBN 7-101-03034-3

I. 福... II. 福... III. 货币-经济史-福建省
IV. F8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0160 号

责任编辑:邱 璐

中国钱币丛书甲种本之十

福建货币史略

福建省钱币学会编著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朝阳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16·27¹/₂ 印张·355 千字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定价:160.00 元

ISBN 7-101-03034-3/H·174

《中国钱币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戴志强
副主编 姚朔民 刘宗汉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贵忱 叶世昌 刘宗汉 华觉明
汪圣铎 吴荣曾 吴筹中 郑仁甲
金德平 姚朔民 黄锡全 裘锡圭
戴志强

《福建货币史略》编纂委员会

主 任 周业樑
副主任 倪健鹤 庄晏成 欣士敏 林正平
晏露蓉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江 真 刘敬扬 吴发灿 吴碧莲
陈宝泉 张凌蓉 林振尧 郑 力
郑 莺 徐心希 蒋九如 赖俊哲
主 编 林正平 蒋九如
副主编 徐心希 赖俊哲
执笔者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敬扬 宋金荣 林兆育 郑 莺
徐心希 蒋九如 赖俊哲

福建货币史略

童赠银



二〇一二年元月十六日

閩錢在中國歷代貨幣中具有顯明的區域特
征。研究福建地區的貨幣歷史，除了依靠文獻
記載之外，錢幣學家做了大量的工作。前輩學者
的功績不可忘記，近十年來的成果更加豐碩。
「福建貨幣史略」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孕育誕生的。
衷心祝賀這部書編著成功，為我國錢幣學
研究作出新的貢獻。

劉志強



庚辰年夏日于北京

三子
大子
可來
避世

順福建休中
史院出版
原仲秋大
佳奇坤



《中国钱币丛书》编辑缘起

近年来,随着我国钱币收藏、研究活动的日趋繁荣活跃,广大读者对钱币学著作的需要也日益提高。读者既需要高水平的研究著作,也需要深入浅出的普及性读物。为了适应这种形势,中国钱币学会准备编辑一套反映当代钱币学水平的《中国钱币丛书》,中华书局也拟出版面向广大读者的《钱币丛书》。在这个基础上,双方协议合作,并邀请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共同编辑出版《中国钱币丛书》,以飨读者。

《中国钱币丛书》分甲种本和乙种本两种:甲种本为高水平的研究著作,力争反映当代钱币学的研究成果。乙种本为高质量的普及性读物,力争融学术性、知识性于一体,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中国钱币丛书》的编辑,尚无经验,在构思选题以及其它方面,必然还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我们诚恳地期望泉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合作与支持,以便能把它办得更好,更能反映当代的学术水平,更能适合广大读者的需要。

《中国钱币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3年4月

编写说明

一、福建省钱币学会成立以来,坚持以探索福建地方历史货币为主,组织开展群众性钱币科研活动。编写过《闽泉谱》(讨论稿),借以引发群众共同探索。十多年来,在广大会员和钱币爱好者的积极参与下,对福建地方历史货币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为进一步理清福建地方历史货币发展的脉络,汇集群众的研究成果,特组织编写《福建货币史略》,以对福建历史货币的研究作一次比较全面的探讨,为后人更深入的研究打好基础。

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货币流通理论,是编写本书的指导思想。编者既依据史籍文献资料的记载和出土发掘的论证,又正视实物的考证;既尊重前辈的见解和论断,又不照搬照套,实事求是地对各历史年代的种种货币现象,努力进行科学的叙述,特别对一时既无法肯定又难以否定的问题,予以保留,待后人作进一步探索。

三、为便于读者了解福建地方历史货币发展的脉络和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本书在按照历史年代的时序,对各年代的货币制度、印铸、版式、发行和相关的货币政策作详尽叙述外,特将革命根据地货币、漳州军饷银币的铸造年代考证和明末清初外国银币的流入等作专题叙述。在叙述中,为突出福建地方特色,对涉及全国性的情节只作简要表述。

四、研究货币史不能缺少实物。本书力求通过实物拓片、照片反映各年代福建地方铸造的金属硬币和福建印制发行的地方性纸币,做到图文并茂。由于民国年间,各地私营钱庄、汇兑庄、信局和商店、商号等发行的纸币有千余种,其流通均受局限,性质雷同,因此只选择部分作附图。革命根据地货币在已出版的《福建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全部作了附图,本书予以省略,请读者见谅。

福建省钱币学会

2001年10月

序

货币是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的产物,并随其发展而不断发展。我国是世界上使用货币最早的国家之一,已有三四千年的货币史。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境内多山。由于高山峻岭的阻隔,上古时期的经济开发滞后于中原一带,早期使用的货币系从中原一带流入,自行铸造货币始于唐代晚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各历史年代先后铸造的金属硬币和印制的纸币有二千余种,版式多种多样,绚丽多彩,内涵丰富。

无论何种货币的产生、发展、消失或转化,都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政治、军事和文化艺术、生产技术水平等各方面因素决定的,是历史兴衰更替的重要佐证。从福建货币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福建的政治、经济发展的梗概,也可以看出福建金融史的发展概貌。五代时期,闽国执政者铸造铅钱、铁钱行使,不仅显示了福建有史以来第一个地方政权的兴衰,从其使用的币材和铸造的工艺,还可以看出当时福建的经济开发和生产技术水平仍滞后于中原一带。北宋时期,朝廷在福建的建州(今建瓯)设置“丰国监”,大量铸造铜钱供朝廷调拨使用,使丰国监成为当时全国四大铸钱监之一。丰国监的设立,表明福建社会经济已由开发进入繁荣,生产技术水平也有很大提高。再从近代福建市场流通的货币看,种类繁多,五花八门,还有不少外国流入的铸币和纸币。其发行的主体,既有国家银行、地方银行、银号和私营商业银行,又有地方权势机构、私营钱庄、银号、商店和地方商会,也有外国银行在福建分设的机构,充分显示了福建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属性;从另一个侧面又显示福建城乡商品经济和金融业已有较大发展,进出口贸易和对外交往也很活跃,生产技术水平也大有提高。

福建省钱币学会组织编撰的《福建货币史略》,不仅理顺了福建历史上铸造、印制和发行的货币脉络,系统地叙述了福建在各历史年代印铸和发行货币的历史背景、种类、版别,以及其消失和转化的原因;并对各历史年代所推行的货币政策和产生的正负效应作了论述和分析;还附有大量的历史货币实物拓片、照片和翔实的史料,是建国以来第一本较系统地叙述福建货币发展史的专著。这是福建省钱币学会成立十多年来,以探索福建地方历史货币为主,组织开展群众性钱币科研所取得的成果汇集,是群体智慧的结晶。该书的出版,填补了福建货币史、金融史、经济史的空白,不仅有历史意义,也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温故而知新,总结历史的经验,在于指导实践。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正、反的历史经验,都不能机械地生搬硬套,要从其发展过程中显示的因果关系,寻求带有规律性的实质,予以借鉴。在新的 21 世纪里,谋求福建的经济和金融有新的发展,了解和认识福建货币史发展

的曲折、复杂历程,不仅可以加深对历史的认识,还可从中吸取教益,有助于当今发展的实践。因此,《福建货币史略》很适合广大货币及金融科研、教学 and 实际工作者学习和使用。历史货币研究是边缘学科,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对于从事经济史、地方史志和文物研究者,本书都值得一读。由于本书不仅对福建有史以来所铸造、印制、发行的历史货币逐一进行叙述,还附有大量的拓片和照片,对广大钱币爱好、收藏者,更是必读的专业书,通过阅读必有助提高对福建历史货币的鉴别能力和认识内涵的欣赏素质。

周紫樑

2001年10月

概 述

福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东临台湾海峡,三面环山,境内山岭耸峙,素有“东南山国”之称。上古时期,人口稀少,海上交通尚未开通。封闭性的地理环境,阻隔福建与中原、江淮的文化、经济联系,经济开发滞后。秦统一后,虽设闽中郡,但未派员治理,仍由闽越王自治。楚汉之争时,闽越王无诸率越人佐汉,待汉高祖登基,“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史记·东越列传》)。《汉书·严助传》对西汉时期越族地区(包括福建在内)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具体的描述,“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地深昧而多水险”,“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林中多蝮蛇、猛兽”,“限以高山,人迹亦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表明福建在西汉前期仍处于原始状态。吴楚七国之乱时,闽越王的继承者余善出兵响应,并策动反汉,汉武帝刘彻以“闽越悍,数反复”,决定废除闽越国,于元封元年(前110)“诏军吏皆将其民徙江淮间,东越地遂虚”^①。彼时虽有少数越人隐匿于崇山峻岭间,只能火耕水耨以维生计,无力从事经济开发。

从东汉末年起,江淮和北方汉人连续不断地逐批涌入福建,福建人口才逐渐增加,在三国两晋时期(3至5世纪)全境只有三四千户,一万七八千人,至唐天宝元年(742)增加至91 240户,410 587人。外来人口增多,不仅经济开发的劳动力增加,还带来中原、江淮一带的先进生产工具、技术和文化知识,大大推动了农业耕作方式的变革,使福建的社会经济逐步进入发展阶段。至唐五代,福建农业生产才彻底摆脱火耕水耨的原始状态^②。宋代以后,随着海上交通的拓展,福建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封建社会经济兴盛时期。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由于外来势力入侵和工商业、金融业的发展,对福建地方的货币发行、流通产生很大影响。

(一)

货币是随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而产生的。福建由于早期经济开发滞后,使用货币进行商品交换则落后于中原和江淮一带。福建史学界对“封建时代福建社会经济形态,划分为前

① 《史记》卷114,《东越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

② 唐文基主编:《福建古代经济史》,第118~119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

后期。前期从西汉至唐五代,后期则是宋元明清”^①。西汉初期生活在福建的闽越人,“仍停留在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之中。如《汉书·景十三王》记载的闽越王与蜀王建的互相交易、赠送的布帛丝绸之类,以及与中原地区稀有的商品交易往来等等,基本都属以物易物或物物等价、不等价交换。《史记》、《汉书》以及后来的一些古籍方志中,也不见有关闽越人使用货币或持有货币的记载”;“其他地区的越人基本上也不使用货币”^②。《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执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砦麻偷生,无积聚而多贪。”表明包括闽越人在内的越人,不通过商品贸易就可满足生存的需求。无商品交换,也不使用货币。

从福建境内出土发掘的古钱记载资料看,1957年崇安(今武夷山市)三姑、1958年闽侯荆溪、1976年崇安角亭和福州洪塘、金鸡山两地汉墓、1989年浦城铁炉山等地,先后出土数十公斤的汉代铜钱,其中两汉五铢大量,西汉半两和王莽货泉少量。文物工作者考证认为,这些铜钱是迄今所知福建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货币,均系外地流入。流入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是西汉初,闽越王无诸率兵佐汉长达8年之久,回师时有可能带回中原使用的铜钱^③;二是汉武帝平定闽越之后一段时间内,大致不会超过武帝执政的中晚期^④。

鉴于闽越人多次反叛中央政府,并攻击东瓯、南越,汉武帝强行将闽越人“徙江淮间,东越地遂虚”,至昭帝刘弗陵始元二年(前85)在福建正式设置行政机构—冶县(今福州),将福建纳入汉王朝政治经济体制^⑤。冶县的设置,使汉政治、经济生活中种种运行机制,随之传入福建。结合文物工作者对出土汉钱流入福建的时间考证,可以认定福建在西汉中晚期使用了货币。

20世纪晚期,泉州、福州两地曾陆续发现数枚青铜铸的海蚶壳状和蛤蜊壳状物,有些人通过考证推测,认为铜蚶壳可能是“闽越无诸时代民间铸造的一种铜贝货币”,或是福建闽越先民模仿内地蚁鼻钱作为“沿海地区人民使用的一种货币”^⑥。铜蛤蜊壳可能是福州民间传说的古代使用的“纽仔(蚬)钱”,或称“蛤钱”,或称“蚶钱”^⑦。但由于无出土发掘资料印证,一时难以确认,尚待进一步探索。

① 唐文基主编:《福建古代经济史》,第10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② 林蔚文:《福建汉代货币几个问题的探讨》,《福建钱币》1987年4月第1期。

③ 赵洪章、赖俊哲:《浦城出土的两汉钱币》,《福建文博》1990年第1期。

④ 林蔚文:《福建汉代货币几个问题的探讨》,《福建钱币》1987年4月第1期。

⑤ 唐文基主编:《福建古代经济史》,第67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⑥ 黄庆卫、李琼霖:《从“铜蚶壳币”谈起——试探福建古代货币的演进变革》,《福建钱币》1989年第2期。

⑦ 林锋:《“铜蛤壳钱”之我见》,《福建钱币》1996年第5期。

(二)

福建铸钱始于唐会昌五年(845)。唐代中期,由于“安史之乱”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朝廷为应付军事和财政开支,一时熔小钱铸大钱,一时又熔大钱铸小钱,出现全国性“钱荒”。加上寺庙遍布,众多僧尼均依赖官府例给,财政负担沉重。武宗为减轻财政负担,并缓解延续六七十年之久的货币紧缩危机,决定“废浮屠法,永平监官李郁彦请以铜像、钟、磬、炉、铎皆归巡院,州县铜益多矣。盐铁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铸,许诸道观察使皆得置钱坊。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大小径寸,如‘开元通宝’”^①。全国废寺庙4 600多所,福建除福州、泉州各保留一开元寺,其余寺庙均废除。福州一地废毁了寺庙70余所,取其铜铸“开元通宝”背福钱,从而揭开了福建铸钱史的序幕。

而后,除元代外,福建历代均有铸钱行使,延续了1 167年。其中具有福建地方特色的铸钱有:1.五代闽国系福建地方独立的政权,以铜、铁、铅三种币材铸钱。所铸“开元通宝”、“永隆通宝”、“天德重宝”当十大钱,背文或上闽下仰月,或穿上殷;而铸“开元通宝”小平铅钱,则贯穿闽国始终,其背文穿上有闽、福、殷、建等之分。这是中国货币史上最早的地方政权铅铸币。2.宋初所铸“太平通宝”背穿上巨星大铁钱,由于面值与内涵背离,民间不愿使用,被朝廷限定只能在福建境内流通,不准流入他省。3.明代所铸“大中通宝”和“洪武通宝”,背文“福”、“二福”、“三福”、“五福”、“十福”的系列套钱,面值结构合理,使用方便。4.南明时期,延平王郑成功、郑经等先后三次铸“永历通宝”,在福建厦门一带和台湾行使达38年之久,系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的见证。5.咸丰四年(1854)始铸的“咸丰通宝”、“咸丰重宝”大钱,面值分一十、二十、五十、一百等4种,成为福建货币史上最大面额的铸钱。这种钱虽有减重,但在全国通货膨胀的局势下,由于币材精良,重量适度,仍受群众欢迎,对稳定市场货币流通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后由于外省粗制轻薄咸丰大钱大量流入,富户大肆收藏福建自铸的咸丰大钱,引起市场物价上涨,出现货币短缺危机,当局又铸“咸丰通宝”小平铁钱行使,民众纷纷拒用,于咸丰八年(1858)三月在福州爆发“铁钱事件”的货币危机,通城罢市,市民捣毁官府,搜抄官员住宅。6.清光绪十一年(1885),福建铸钱工艺进行改革,使用机器铸“光绪元宝”背福钱。7.民国初所铸“福建通宝”,为显示封建王朝的覆灭,在形制和饰文上都与传统的方孔圆钱有差异:一是由方孔改为圆孔;二是面文不使用年号或吉语,而用福建地名;三是背文不使用星、月,而饰以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起义时所举的革命旗帜。这枚钱也是中国货币史上最后一枚有孔圆钱。

^① 《新唐书》卷54《食货志四》。

(三)

福建是中国最早铸造银币行使的省份之一,仅次于西藏。清道光十七、十八年(1837—1838),福建台湾府仿效西班牙银币铸寿星银币(银饼),俗称“老公饼”,币面有“道光年铸”字样,可确认系道光年铸无疑。至于“漳州军饷”银币,因史籍文献无记载,币面无铸造时间标志,钱币学界有的认为是南明年间郑成功铸,有的认为是清道光或咸丰年间铸,众说不一。如果确认“漳州军饷”为郑成功所铸,则比西藏铸造银币时间提前130多年,福建铸造银币的时间则提早近200年,为中国最早铸造银币行使的省份。

福建大量铸造银币的时间是清末民初,主要是铸造银辅币。民初铸造的银辅币:一是流通纪念币多。由官方铸造的银辅币,按币面饰文和面值不同统计有4种11个版别,有“革命军北伐胜利纪念币”、“革命军东路总指挥入闽纪念币”、“总理纪念币”和“黄花岗纪念币”,其中“黄花岗纪念币”延续铸造5年。二是盗版劣质银辅币多。民初,统治福建的军阀们借口筹措军饷,大肆铸造盗版劣质银辅币,强制行使,为后期市场货币流通混乱埋下了祸根。

清光绪晚期,福建还试铸“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的规范银元,系收藏珍品。其铸造时间有三种说法:一是光绪二十六年末至二十七年初;二是光绪二十八年;三是光绪三十年。

福建铸造铜元始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系全国最早铸造铜元的省之一。彼时铜价上涨,铸造制钱亏本,全国制钱短缺,而机制铜元制作精美,投入市场颇受欢迎,并上调朝廷行使。福建所铸“光绪元宝”铜元,面文有满文“宝福”,其面值有五文、十文、二十文3种。后由于铸铜元有余利,发行量超过市场需要而贬值,铸铜元出现亏损,一度停铸。民国初,铜元仍是主要辅币,铸“中华元宝”铜元行使;至法币政策推行后一段时间,铜元继续充当辅币。而后,铜元虽退出流通领域,但民间贮藏甚多,在法币、金元券、银元券恶性膨胀时,又与银元匹配,作为辅币使用。

(四)

福建行使纸币始于南宋的“会子”。《续文献通考》卷7《钱币一》记载,宁宗嘉泰年间,行都临安(今杭州),官会一贯可换七百二三十钱;稍远的建州(今建瓯)、南剑州(今南平),会子一贯只能换得不足六百钱。《宋史·食货志》又记载:“泉州守臣宋均,南剑州守臣赵崇亢、陈宓皆以称提失职,责降有差。”称提即办理纸币会子兑换。以上史籍记载表明福建最迟在嘉泰年间(1201—1204)已使用“会子”。

而后,元、明两代使用朝廷统一发行的“中统元宝交钞”、“至元通行宝钞”、“至大银钞”和“大明宝钞”。至清代晚期才出现福建地方纸币,从所见实物看,私营钱庄、银号发行的“私票”,最早在道光年间;福建“永丰官钱局”于咸丰(1853)始发行“官银票”和“大清宝钞”(钱票)。鸦片战争后,福州、厦门被迫对外开放,英商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和日商台湾银行先后在

福州、厦门设立分支机构,并发行“银元票”,使福建货币史沾染半殖民地的色彩。

民国时期是福建纸币发行最混乱的年代。前期行使可兑现纸币,政府事前未监控,发行主体众多,既有国家银行、地方银行、私营银行,又有外商银行;既有金融业钱庄、银号、汇兑局、民信局,又有商号、商店、商会。有些控制地方政权的军阀则以筹措军饷为名滥发纸币,由军阀李厚基控制的福建银行在李下台时,发生挤兑,仅“台伏票”一种无法承兑的高达130万元;地方军阀卢兴邦在统治尤溪期间,先以“广豫汇兑庄”名义发行银元票,一年后借口有人伪造,突然宣布广豫纸币作废,致使众多的工商业关门停业,千家万户群众遭受损害,次年又以“华通汇兑庄”名义发行银元票,仅使用4个月又宣布四折回收。

民国时期福建流通的纸币本位制几经变更:1.1935年11月2日前,以银元为本位,可兑现。2.1935年11月2日后,纸币不兑现,改称“法币”。3.1948年8月19日后,使用金元券,声称金本位。4.1949年7月3日后,使用银元券,改为银本位,声称可兑现,实际是有限制兑现。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民政府发动内战,推行通货膨胀政策,滥发纸币,货币危机频频发生,全国物价飞涨,福建也不例外。在法币崩溃前的1948年7月1日,福州市场零售物价指数比1937年上半年上涨198万倍;以金元券发行前的1948年8月15日为基数,至次年4月2日,大米上涨5518倍,黄金上涨4400倍;6天后大米又翻番,上涨至21633倍,黄金上涨至18000倍;5月19日大米无行市,黄金上涨至1.4亿倍,国民政府的恶性通货膨胀,给福建人民造成的痛苦,罄竹难书。

抗日战争期间,福州、厦门一度为日军侵占,日军票、伪储备券也曾市场横行;厦门伪政权办的劝业银行也发行纸币流通。

(五)

福建官方印铸货币的机构,最早出现在唐会昌五年(845),始铸“开元通宝”背福方孔圆钱。五代闽国先后在福州、泉州、建州铸铜、铁、铅钱,铸钱机构的设置,史籍未记载;至南唐统治时,在建州设“永丰监”铸钱。宋初,在建州先设铸钱场,于咸平三年(1000)升格为“丰国监”属朝廷直属铸钱机构,与江州广宁监、池州永宁监、饶州永平监并列为北宋全国四大铸钱监。丰国监年铸钱量在20至30万贯之间,终于绍熙五年(1194),历时195年。元代福建未铸钱,1962年福州文物部门征集文物时,曾发现“至元宝钞”铜版残片,是否说明福州曾设有宝钞库或印造库,印制过“至元宝钞”,尚待进一步考证。明代福建既有铸钱,又发行纸币,但史籍未见铸钱、印钞机构设置的记载。

清代福建铸造制钱的机构有三个:宝福局、宝漳局、宝台局,分别铸福字、漳字、台字钱。清光绪十一年(1885)前,台湾隶属福建,其行使的制钱主要由福州供应。清末光绪年间铸造银币、铜元时,铸币的机构名称增多,先是商办“银元局”设立,择址福州南台苍霞洲(现银局里),由于朝廷干预,不久收归官办,改称“福建官银局”,铸造银币;待开铸铜元时,在福建官

银局设“福建铜币局”，后改称福建造币分厂、度支部造币闽厂，铜币局下属三所厂局：南局（设银元局）、东局（闽海关铜币局，在马尾），西局（在西郊洪山桥）。

民国初，军政府对前清官银局所属的造币厂整顿后，改称福建造币厂，铸造银币时则称银币厂，铸造铜币时又称铜币厂，一身两任。北洋军阀李厚基统治时，将造币厂由苍霞洲迁至洪山桥。此后，大量铸造银辅币，直到1932年冬告终。民国期间，福建所发行的地方性纸币，其中银行纸币多数在外地印制，有的是美国印钞公司，有的在上海、香港印制，唯有福建省银行发行的法币和银元辅币券，系福州当地私营百城印务局承印，该局设立于1926年，抗日战争期间迁至南平，彼时中央银行运钞车难以抵达福建，海上交通被日军封锁，在1941—1945年还为中央银行印制法币行使。

（六）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福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创建了闽西、闽北、闽南、闽东等革命根据地和闽中游击区，为使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在摧毁国民政府地方政权和旧金融体制的同时，相继发行独立自主的货币，在福建货币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彼时，各革命根据地的区域，有的连片，有的处于分割状态，为适应战时环境对敌斗争的需要，货币发行的主体则因地、因时制宜，有银行、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也有以苏维埃政府、部队和消费合作社等名义，计有20个单位，发行纸币55种版别、银币两种版别。纸币的面值多数为1元及1元以下的辅币，也有面值50元和100元专门用于对国民政府统治区贸易结算的兑换券。货币的印铸绝大多数在根据地内进行，闽北根据地设有印刷厂印制纸币和造币厂铸造银币，闽西工农银行内部设有印制纸币的职能机构，有的委托私营印刷厂商印制，有的自行手工印制或借用禁止流通的私商纸币加盖相关印章后发行使用。

无论在土地革命时期和解放战争期间，货币的本位制基本是以银元为价值基础（个别以大米两为本位）并可兑现。在流通过程中，币值基本稳定，主要是兼顾了战时货币的特殊规律和货币流通的一般规律，在支援革命战争夺取胜利，巩固和扩展根据地的前提下，十分注意控制财政性投放，致力实现经济发行。

（七）

福建沿海多良港，早在隋唐年代，海外贸易就已兴起，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货币的流出、流入也十分频繁。

宋代主要是铜钱的大量外流。彼时，中国的生产技术较先进，铜钱制作精美，颇受外国人青睐，《宋会要》记载蕃人“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宋史·食货志》记载“钱本中国宝货，乃与四夷共用”。泉州在唐代已是四大贸易港口之一，至宋代已逐渐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通商的主要港口，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列为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海外船舶穿